



冊大多為宋代作品，第10冊之後多為清代、民國時期之作。而其〈凡例〉中也提及各冊收錄內容是依時間先後排列，但卻在第9冊夾雜兩部清代著作又於第18冊出現明代人著作。不僅全套《日記》前後排序標準不一，單冊之內的排序也令人匪夷所思，如前文提及之第4冊內容，同一冊中收有2部陸深日記，卻沒有緊連排列一起，中間卻夾雜都穆與楊豫孫之書，若是依版本為序，此二部書也都是嘉靖24年刻本，楊豫孫之書則為萬曆間刻本，排列規則毫無線索可循。

(三)索引的編排方式

索引的編排方式是採用中國大陸現行的漢語拼音方式，以英文字母排序，但筆者認為應以傳統部首筆畫方式排列為佳，漢語拼音因採擬音方式，比較無法確切標明中國字音，易有模稜兩可的情況發生。其他還有字體印刷未轉換成繁體而以簡體呈現、標點重複等小問題。

五、結語

日記具有種種翔實的史料，浙江大學郭汾陽教授認為「日記、書信及年譜是文史研究的三大基礎」，因而提出設立「日記學」的學科。復旦大學歷史系鄒振環教授更提出「日記文獻學」的想法，認為眾多日記文獻涉及的刊本、稿本、偽本問題屬於文獻版本學的範疇，另外日記文獻中，作者本人或後輩對其

文字所做的刪改、塗抹，以及文中避諱字等等則是文獻校勘學的部份。日記載錄許多作者親身經歷的歷史事件，可補正史之不足，有些模稜兩可的數據，也可由個人日記中參互比對，得知正確發生的時間。在在無不顯示日記所具有的歷史文獻價值。

閱讀日記，往往會有意外的收穫，例如李源澄先生為民國時期著名經學家，經學研究成果豐碩，但其相關資料卻寥寥無幾，林慶彰教授曾無意間由《吳宓日記續編》中獲得李源澄先生的相關資料，尤其對其往生前描述甚詳，為研究者提供不少資料，由此可見先人日記對學術研究之貢獻（詳見林慶彰〈我蒐集李源澄著作的經過〉，《經學研究論叢》，第15輯，2008年3月）。編纂一部大型叢書是相當辛苦的，撰寫提要尤其難，提要是全文內容的縮影，要撰寫這樣精練的文字，相當耗費精力，編者群於撰寫《姚錫光日記》提要時，由於姚錫光並非著名歷史人物，於一般工具書中很難查到姚錫光的個人資料，但他在清末軍政事務中是個非常重要的人物，又於籌建近代海軍有功，因此花費相當多的時間、精力翻找大量文獻史料，才得以撰寫此條提要內容。對於願意孜孜矻矻勤勉於小眾議題、不被人知的史料挖掘與文獻整理，應給予鼓勵，祈望能有更多人投入那些被遺忘、不受重視的領域中，為學術研究，貢獻心力。❦

潛心明清出版文化研究

——訪大木康教授談馮夢龍和相關問題

*葉純芳

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

大木康教授，日本橫濱人，1959年1月生。現為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東亞細亞第二研究部門文學教授，是研究「中國晚明文化事業」、「馮夢龍研究」的專家。

大木教授的中文說得很好，與中文的淵源也很深。1971年，大木教授就讀於東京私立開成中學。由於日本與中國是邦交國，有許多機會接觸中國文化，他自中學2年級起，對中國文化由好奇，進而喜歡中國文字的優美，並對中國文學產生濃厚的興趣。中學3年級，正式開始上漢學課程（日本所謂的「漢文」課），當時為他們教授漢文的老師是現今京都大學教授的麥谷邦夫老師。由於本身的興趣，再加上麥谷老師深入淺出的教學方式，使大木教授在青年時期就立定志向朝研究中國文學的路邁進。

一、求學階段

1977年，大木教授進入東京大學教養學部，正式學習中文。當時教養學

部中文教室的主任是伊藤敬一教授。伊藤教授教中文以外，還開設閱讀馮夢龍《三言》的課程。課程中，由於讀了〈賣油郎獨佔花魁〉，大木教授因而對馮夢龍與《三言》產生濃厚的興趣，決定以馮夢龍為研究對象。這是大木教授與馮夢龍研究的初次邂逅。1979年，他分發到文學部中文系就讀，全班雖然只有他一個學生，不過卻有幸能夠受學於即將退休的前野直彬教授，帶領他讀錢謙益的散文、王勃的詩，使他體會更多中國古代詩詞散文的優美。在他大學畢業的同時，前野老師也退休了。

在大木教授求學的歷程中，影響很深的是出名的紅學家——伊藤漱平教授，引領他進入《紅樓夢》與李漁作品的世界。1981年，他就讀東京大學中文系碩士班，仍舊只有他一個學生，他的碩士論文即由伊藤教授指導，題目為「馮夢龍及其「三言」研究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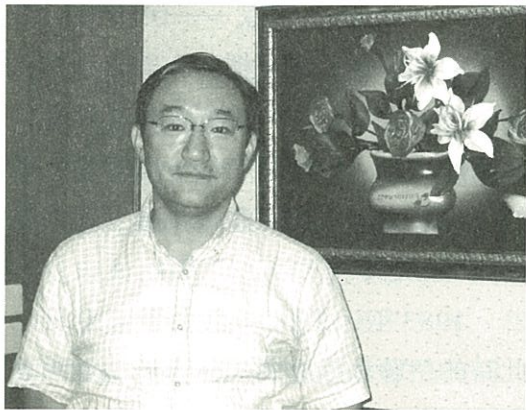
1983年，進入東京大學博士班。此時的伊藤教授即將退休，於是他跟著研究馮夢龍及魯迅的專家——尾上兼英



教授（後來任東洋文化研究所所長）做研究。就學期間，不論是大學、碩士班或是博士班，選擇中文系攻讀的學生很少，常常只有他一人，沒有同儕可以共同討論學習，幸賴伊藤教授、尾上教授、田仲一成教授等人不斷鼓勵提攜他，才能在這種孤獨的研究環境中走出自己的研究方向。

1984年9月至1985年8月，他在上海復旦大學留學。期間，他到各處旅遊、拜訪老師、參觀圖書館，與導師江巨榮教授、章培恆教授、黃霖教授有了較多的接觸。

1986年4月，他考上了東洋文化研究所的助手職位，研究環境雖然好，但有5年工作時間的限制，不能延長。1988年，大木教授在此工作的第2年，由於表現出色，被廣島大學文學部中文系延聘為副教授，開設「唐詩」、「唐宋散文」以及「明清小說」的課程。他回憶道：廣島大學以前是廣島高等師範學校、廣島文理科大學，是師範學校的系統，課程的安排規劃相當嚴格，只有



▲大木康教授

主任教授才能上文學史，一般副教授僅能教授閱讀文本的課程。但他在廣島大學教書的第3年，主任橫田輝俊教授退休，即使他在當時只是副教授，仍被委以教授文學史的重任。這個經驗對他後來的教研工作有很大的幫助。

1991年，大木教授被東京大學延聘回校擔任文學部中文系老師，之後，每年都開設「戲曲」、「小說」、「明清散文」等不同的課程。因為有了廣島大學的教學經驗，他認為應該提升學生的學術基礎，加強學生文獻學方面的知識，因此開設了「四庫提要」、「目錄版本」等課程。

1993年，他獲得日本文部省在外研究經費，到上海復旦大學及美國哈佛大學蒐集資料。他的博士論文《馮夢龍《山歌》の研究》大致是在此時期逐步進行。接著，他花了5年的時間，將多年來蒐集的資料、讀書的心得、與前人不同的見解一一整理出來，並將馮夢龍《山歌》380篇的作品，400年前的蘇州方言全部翻成日文，做詳細的分析，於1998年完成《馮夢龍《山歌》の研究》，取得文學博士的學位。

二、馮夢龍研究

大木教授近20年的學術研究，基本上以馮夢龍為根據地。不過馮夢龍的著作內容相當豐富廣泛，除了《三言》、《山歌》、《笑府》等較出名的俗文學的著作外，另有關於科舉的參考

書，也有研究《春秋》、《四書》的著作，大木教授認為這些一定要全面加以研究，才能真正了解馮夢龍。

舉例來說，由於馮氏在晚明的蘇州活動的範圍相當廣泛，與書商有著密切的關係，因此必須研究晚明蘇州的出版文化。又例如他與青樓文化有密切的關係，研究青樓文化，也成為大木教授必須關心的課題。他的做法是以「馮夢龍」為中心，慢慢擴散出去，雖然辛苦，不過也因為研究馮夢龍，而意外獲得許多從未開發的課題。1991年，他出版《明末江南における出版文化の研究》一書，可說是學術界研究中國明代出版文化的先驅，起了開創的作用，後來加以修訂的《明末江南の出版文化》已在韓國被翻譯成韓文。

馮夢龍身為一個書刊編輯家，他的書刊編輯的想法如何？選《三言》的標準在哪裡？大木教授在研讀博士時，第一篇所寫的文章即有關這個問題。在《三言》中，有自上古至明代，各種題材的作品共120多篇，他發現以前的研究者，總是傾向於探討《三言》中的作品哪些是精華？哪些是糟粕？學者總想將這些所謂的「精華」與「糟粕」梳離開來。但這些學者都忽略《三言》是馮夢龍自己所選擇的作品，如果拿它與之前的小說作品比較，有不少作品馮氏沒有選擇。因此大木教授相信馮氏編《三言》的時候，是有所抉擇的，自然不會有精華與糟粕之分。他認為從前學者在

探討馮氏選取作品的價值觀時的關鍵，在於「封建」與「反封建」。例如，大部分的研究者認為《三言》中有關節婦、烈婦、忠義的故事代表封建的，是糟粕；又如「杜十娘」的故事，則代表反封建的故事。但大木教授不這麼看馮夢龍，他認為「封建」與「反封建」不過是現代人的標準，而馮氏一再強調的是「真情」。因此，馮氏選取作品的標準，應該在於他認不認為這些故事中人物的行動是否發自真情，與封建、反封建沒有關係。

此外，也有很多學者將《三言》與凌濛初《二拍》合併在一起討論，大木教授認為這兩部書中的內容有較大的差別，不適合放在一起討論。諸如此類，對馮夢龍還有許多題目要做研究。所以大木教授盼望在自己退休前，能夠對馮夢龍研究做一個完整的交代。

1999年至2000年，他到哈佛燕京學社擔任訪問學人，在那裡大致完成了「南京秦淮青樓文化研究」的初稿。接著到南京，想對秦淮河做詳細的考察，於是他左手拿著一幅清末南京的地圖，右手拿著現代的地圖，實地去走一趟，發現清末的地名實際上與晚明差不多，甚至當時文人的故居，有些到現在都還存在著，他感到既高興又感動，更確認唯有實地去考察，才能感受當時文人的環境與情景，是非常有意義的一件事。於是，他在2001年年底出版《中國遊里空間——明清秦淮妓女的世界》一



書。此書於2006年在臺灣被翻譯成中文，書名：《風月秦淮——中國遊里空間》。

最近幾年，也由於研究明末清初的青樓文化，在偶然的機會中，他開始對冒襄（辟疆）的《影梅庵憶語》產生極大的興趣，並將它全部翻譯成日文。他說之前研究馮夢龍，是研究俗文學；現在研究明末四大公子中的冒襄，是研究較高級的文人文化活動。冒襄在晚年編了一本《同人集》，其中都是他的朋友、老師為他寫的文章或互相酬唱的詩，可看出冒襄的交友範圍與活動，大木康教授希望以冒襄為中心，研究明末清初的文人活動。目前已發表過幾篇文章，希望在2、3年中能做出一個好的整理，在東洋文化研究所出版有關冒襄研究的書。

從美國回國後，大木教授於2002年升調東洋文化研究所擔任副教授，之後，更升任教授。

三、對「域外漢籍」與「古籍數位化」的看法

近年來，「域外漢籍」與「古籍數位化」成了研究漢學的新興熱門話題，大木教授對於「域外漢籍」這樣的說法感到不一定是非常適合，因為有「域外」就會有「域內」，「內」與「外」之間有相當明顯的上下高低的分別，如「內行」與「外行」。大木教授認為中國漢字文化的偉大性就在於其國際性，使

用中國文言文，當時的韓國人、日本人、越南人都能夠溝通。雖然難免有寫得好與不好、地道與不地道的不同，還有各個地區的著作應該有它的地方特色（這地方特色也是值得研究的一點），但重要的是當時中國文言文確實成為東亞地區的共同語言。因此，不贊成漢籍中劃分內外之界線這樣的想法，尤其不贊成使用域外的「外」字。

至於「古籍數位化」，以東洋文化研究所的《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》為例，大木教授說這個資料庫只是所藏書的其中一部分而已。他認為今後應該繼續做此公開的事業。可是，應不應該全部公開，這點在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們的意見是有分歧的，大木教授認為將來的趨勢應該會逐漸加強要公開這些資料，但這類公開圖書的事業也必須與國內外機關的協力協調，才能夠獲得好的成果，大木教授表示他會為此效一己之力。

目前方便學者查詢日本漢籍的資料庫，大木教授認為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主編的《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數據庫》與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所編的《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》，是日本比較不錯的資料庫，此外二松學舍大學的《日本漢文文獻目錄資料庫》也很好。在此資料庫查詢，例如輸入「袁枚」，不但在日本出版的袁枚著作都可查到，而且此資料庫和京都大學的《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數

據庫》相連，因此有關資料也會出現。

四、對漢學研究環境的看法與建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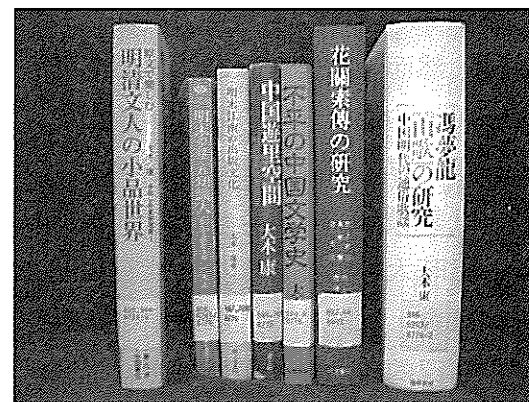
以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的文獻材料而言，大木教授認為研究所有許多的漢籍材料，但真正研究古典的人幾乎沒有，是件很可惜的事情。他身為研究所的教授，雖然努力去研究、利用這些文獻，但力量微薄，他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可以利用這些漢籍資料。至於東洋文化研究所的定位，他希望能夠擴編中國文化方面的研究。目前東洋文化研究所分為東亞研究、東南亞研究、西亞研究等幾個部份，其中東亞研究又分成兩個小組，歷史、經濟方面較多人研究，真正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人非常少，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。

大木教授去過許多國家，在比較過各國的情況後，他認為東洋文化研究所在研究環境來說，算是一個非常好的環境。至於其他國家研究漢學的條件，他個人認為臺灣的中央研究院、臺灣大學與美國的哈佛燕京較關心日本的研究成果，資料的蒐集也很方便，甚至可以說在臺灣、在美國研究，與在日本研究，條件上沒有什麼差別。而中國大陸或許是因為購買圖書經費不足（日本的書也很貴），國外研究成果較少，導致他們對海外的漢學研究了解較少。

目前在日本各大學，中文系與中國哲學系有許多中國大陸與臺灣的留學生，或是其他各國的留學生，大木康教授認為，以現有的條件，使用傳統的方

式來研究中國文學，到日本去留學是沒有多大意義的，但是如果以一個嶄新的角度與資料來研究，會比較有意義。其中，日本漢學應是一個值得投入的新領域。日本文人所寫的「漢文」雖然帶有些所謂的「和臭」（日本味），但還是漢文，中國、臺灣的學生來讀是沒有問題的。

林慶彰老師提到日本學者有個偏見，他們認為中國的儒學還是比日本的漢學重要，可以等中國研究完，再來研究，才有本末之分。但是研究一門學問需要幾十年的時間，當中國的儒學都研究到一個水平的時候，研究者的年紀幾乎已經垂垂老矣，沒有力氣再做研究了。大家在這樣的偏見中，重複循環，並且拋脫不了這樣的循環，日本漢學就在這樣的循環中犧牲了。大木教授認為林老師說得很有道理，期盼能有更多的留學生能夠到日本學習，挖掘這些資料，希望臺灣的學生到日本，能研究日本漢學，因為日本漢學連日本人也很少研究。



▲大木康教授之著作